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姻”：回顾和前瞻

王洪林

(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 文章对翻译符号学和符号翻译学两个跨学科分支进行系统梳理和综述分析, 回顾符号学和翻译研究的“联姻”, 发现二者交叉研究的焦点, 总结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前瞻性预测并提出建议, 以期对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与融通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

关键词: 符号翻译学; 翻译符号学; 皮尔士; 格雷; 符号表意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22) 06-0116-08

0. 引言

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始终是翻译界讨论翻译本质问题的立足点。无论是对“字对字”与“意对意”的争论, 对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的探讨, 对百余年来围绕严复在译者序中就译事之难而提出的“信达雅”概念的讨论, 还是西方学者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对等”“等值”问题的研究, 大多围绕翻译中的符号意义, 尤其是语言符号意义的表达、再生、传递与交流等展开。多年来, 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作为重要的翻译研究范式之一成果丰硕。数字化时代的多模态翻译、符际翻译实践逐步增多, 仅从语言学视角切入, 很难解释多模态、跨模态、跨媒介以及跨符际翻译的转换问题。在此背景下, 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渐受关注。

学界对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跨学科“联姻”的讨论由来已久。就两者“联姻”开始的时间而言, 如果从维特根斯坦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的图像理论和语言游戏算起, 符号学与翻译“联姻”已有百余年历史; 若从皮尔士对翻译问题的探讨算起, 则已有近百年历史; 即便从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翻译三分法算起, 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王铭玉 2015: 23)。符号学和翻译学“联姻”后出现了两个学科分支, 即作为符号学分支的翻译符号学和作为翻译学分支的符号翻译学。鉴于符号学和翻译研究跨学科“联姻”的渊源及其对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借鉴价值, 下文将对两者“联姻”进行细致的回顾与梳理, 探讨两个分支学科的学科框架和学科内涵, 并据此预测两者跨学科研究的前景, 以期对翻译学和符号学之间的跨学科互鉴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

收稿日期: 2021-01-30; 作者修订: 2022-07-12; 本刊修订: 2022-07-15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诗画浙江’文化符号的跨媒介与跨模态符际书写研究”(2023B026);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科研与创作项目“‘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系列外宣片国际传播效果研究”(2022KYY029)

作者信息: 王洪林 (1978-), 女, 安徽阜阳人,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符号学和应用语言学, E-mail: fycarol61@163.com。

1. 作为符号学分支的翻译符号学

翻译问题受到符号学研究学者的关注为时已久。早在19世纪末,在皮尔士对符号学开展的研究中,翻译或者阐释已经成为符号学关注的焦点问题(赵星植 2017)。20世纪初,维尔比夫人(Lady Welby)的符号学研究不仅涉及翻译问题,且对其展开了深入、系统的讨论(Petrilli 2009)。无论欧陆还是英美均不乏从符号学视角探讨翻译问题的学者。法国哲学与符号学研究者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从哲学与符号学双重视角探究翻译问题,对翻译研究范式及不可译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Ricoeur 2006)。意大利符号研究学者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从符号学视角审视翻译活动,聚焦戏剧翻译、影视翻译等视听翻译研究(Eco 2001)。意大利学者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2014: 210)认为,“翻译理论不可能脱离翻译符号学。反之亦然,符号理论能够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中受益”。有学者提出,符号学学派开展翻译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包括皮尔士、雅各布森、尤里·洛特曼(Yuri M. Lotman)与艾柯(Kourdis 2015: 310)。符号学研究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关注,既说明符号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存在久远且联系密切的理论渊源,也说明符号学可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已成不争事实。

莫斯科-塔尔图文化符号学派对翻译问题展开过系统、全面的研究,并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Lotman 1990; Torop 2000, 2007)。洛特曼开创了文化符号学研究先河。他提出的符号域与文化空间概念对符号学、文化研究以及翻译研究均有重要借鉴意义。文化符号学派后来者彼得·特洛普(Peeter Torop)所开展的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针对性更强。吕红周、单红(2016: 33)认为,彼得·特洛普提出“翻译符号学过程观、文本观、整体观勾勒了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前景”,是开展翻译学和符号学融合研究的代表者之一。

国内学者对翻译符号学的学科界定、理论框架及学科内涵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王铭玉(2015)基于语言符号学提出翻译符号学学科框架,且对国内外翻译研究与符号学的交叉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贾洪伟(2016b: 92)提出,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主要特征包括:用符号学理论分析和解释文学翻译现象、社会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等;佟颖(2010)从社会符号学理论视角出发讨论了翻译动机、翻译过程、语码和语域问题;潘琳琳(2016, 2018a, 2018b)从翻译符号学视角系统考察了《红高粱》电影剧本、台本及小说之间的符际转换和意义变形问题;贾洪伟(2016b: 90)系统梳理了1988年以来符号学翻译研究成果,对建立与语言符号学并立的分支学科,即翻译符号学的必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批判性分析。贾洪伟(2016a: 96)认为,翻译符号学借鉴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指导,考察了翻译过程中的符号转换问题。可见,翻译符号学通过对跨符号转换这一翻译核心问题的探讨,旨在超越传统符号学所关注的单语与单文化符号表意问题,有助于拓展符号学研究范围与疆界。王铭玉(2015)就曾将翻译符号学与语言符号学并列纳入符号学分支学科。中国学者对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与翻译实践的考察进一步夯实了翻译符号学研究基础。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曾于2016年第5期开设“翻译符号学研究”专栏,收录的5篇文章分别从符号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了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框架和实际应用。其中,《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一文从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功能和符号守恒7个层面探讨了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等问题(王铭玉 2016)。该文不仅为翻译符号学前景绘就了路线图,也为推动翻译符号学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有研究指出,翻译符号学“旨在建构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理论体系”(王铭

玉、任伟 2017: 26)。潘琳琳 (2018b: 61) 指出, 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转换”。可见符号学与翻译研究学者对翻译活动符码转换问题的共同关注, 进一步说明符号学与翻译学对话的必要性及跨学科研究的潜力所在。

除上述讨论外, 系列博士论文考察了莫里斯 (Charles Morris) 与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 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国内学者的 4 篇符号学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①主要借鉴社会符号学理论 (王铭玉、任伟 2017: 28)。孙凤 (2019: IV) 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理论研究》对除皮尔士、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之外的“第三位符号学理论奠基者”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考察。这是除佩特丽莉之外, 对维尔比夫人符号学或表意学进行系统引介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不过, 大多西方学者的翻译符号学研究并非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 似乎有空谈理论之嫌” (王铭玉、任伟 2017: 27)。

2. 作为翻译学分支的符号翻译学

上文讨论了符号学研究者通过考察翻译问题以拓展符号学研究视野, 接下来聚焦符号学理论视角、观点与方法指导下的翻译研究。

就符号学理论自身发展的路径而言, 符号学有两个源头, 一个是美国学者皮尔士从逻辑-哲学学科视角出发, 基于符号过程研究提出的符号学 (Semiotics), 另一个是瑞士学者索绪尔从语言-结构主义学科视角出发, 基于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符号系统研究而提出的符号学 (Semiology) (Lorusso 2015: 3)。皮尔士符号学除对翻译研究提供借鉴价值外, 其与传播学之间的渊源也渐受关注。(赵星植 2017)

佩特丽莉从总体符号学 (Global Semiotics) 出发, 聚焦符号学与伦理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并从解释项视角对翻译中的符号问题、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创见的阐发, 对翻译研究的借鉴价值明显 (Petrilli 2009; 佩特丽莉 2014)。从符号学视角开展翻译研究的成效显著 (Gorlée 1994; 佩特丽莉 2014)。

作为符际转换的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活动。许钧 (2014: 48-49) 将“符号转换性”看作翻译的本质属性之一。王丽娟 (2013: 61) 认为, 翻译的本质是符号系统间的转换, 符号学和翻译研究关系密切, 两者均涉及信息或文本。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开展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也有助于拓展符号学研究的疆域” (Wang 2018: 160)。此外, “符号学进入翻译领域, 使其脱离‘玄学’而彰显其生命价值, 翻译的本质、规律、模式等也可在更为开放、互动、系统的理论框架下得到更大程度的解释” (潘琳琳 2018b: 1)。总之, 从符号学视角审视翻译中的意义再生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王铭玉、任伟 (2017: 28) 认为, “中国翻译学处于各种理论的‘分治’或‘独白’状态, 西方翻译学与中国传统翻译学自说自话”。要改变此现状, “符号学和翻译学交叉”将会是一个重要契机。

关于符号翻译学的发端, 当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雅各布森率先借助符号学理论开展翻译研究 (贾洪伟 2016c: 11)。也有学者认为: 国外符号学与翻译学合流始于 20 世纪中叶, 得益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的启发, 雅各布森、丁达·格雷 (Dinda L. Gorlée)、特洛普以及道格拉斯·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 等学者以符号本质与转换规律为切入点, 对翻译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潘琳琳 2018b: 1)。贾洪伟 (2018: 29) 肯定了如下几位学者的贡献: 奈达 (Eugene Nida) 从社会符号学视角对《圣经》翻译问题的研究, 格雷从符号转换视角对

皮尔士符号观的研究及其对翻译问题的探究,图里(Gideon Toury)在文化符号学框架下对翻译问题的考察。姜奕村(2017: 70)认为,“最早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学者当属俄裔美国语言符号学家 Roman Jakobson 和美国翻译理论家 Eugene Nida”。可见,几十年来翻译界一直有学者从符号学视角开展翻译研究已成不争事实。

国内首次提出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姻”概念的文章是1988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罗进德1988)。整体而言,国外学者对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关注得更早,也更成体系。

德勒达勒·罗德(Deledalle-Rhodes)和格雷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符号学翻译(Stecconi 2007: 16),并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格雷于1989年发表的论文《维特根斯坦与翻译: 符号学方法》(Wittgenstein & Translation: A Semiotic Approach)标志着符号学翻译研究正式开始。格雷提出符号翻译(semiotranslation)概念,聚焦听觉翻译,尤其是以歌曲翻译为主的符际翻译,并在皮尔士符号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符号对等(semiotic equivalence)概念,进而将其细分为质量对等(qualitative equivalence)、指称对等(referential equivalence)与表意对等(significational equivalence)(Gorlée 1994, 2004, 2005)。学界广泛认可格雷在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姻”方面做出的重要跨学科贡献(贾洪伟2018: 30)。她被看作“首位系统、深入地以皮尔士符号学视角探讨翻译问题的学者”(潘琳琳2018b: 20)。格雷于1990年首次提出“翻译符号学”概念,后改为“符号翻译学”,对符号学与翻译学学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格雷2019: 1)。姜奕村则认为,“系统性地阐述符号学与翻译研究关系的论著产生于1994年,荷兰学者教授 Dinda Gorlée (1994) 基于皮尔士符号学理论探讨了翻译中的符号转换现象”。格雷提出的“符号翻译”概念将语言翻译拓展到普遍的符号翻译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姜奕村2017: 70)不过,学界至今未对“翻译符号学”与“符号翻译学”概念的异同、关联,概念变化的理据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展开系统分析。

关于格雷提出的符号翻译学,贾洪伟进行了系统的译介与研究,尤其对格雷的符号翻译学奠基之作——《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的译介和对《翻译符号学初探——以格雷论文选析》的编著(格雷2019; 贾洪伟2020),均为国内学者全面了解符号翻译学提供了重要契机。王铭玉在前者的译著序中指出: 从普通符号学与翻译“联姻”角度来看,格雷的这部专著是“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姻’的奠基性作品”(格雷2019: 10)。

格雷就符号学翻译研究进行了几十年探索,为符号学翻译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不过,其研究也有不足之处。贾洪伟(2018: 29)认为,格雷的研究聚焦符号转换,对翻译行为、过程、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导致的文本变异行为关注不够。换言之,格雷对文本在文化空间中的变异问题回应较少。另外,格雷符号学翻译研究的持续性和系统性不足,理论体系建构有待加强(格雷2019: 3)。格雷学术兴趣的广泛以及学术身份的多元,使其研究没有固定在符号翻译学领域,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符号翻译学理论体系。即便如此,格雷对符号学视角翻译研究的系统性探索特色鲜明,其研究范围之大、研究对象之多、辐射范围之广,是其他类似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王铭玉、任伟 (2017: 27) 将格雷提出的符号翻译研究归入翻译符号学, 指出其理论对语际翻译实践的阐释力度不够。本文认为, 格雷的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均在于翻译核心问题, 其目的是解决翻译研究所面临的符号转换问题, 因而将其归入符号翻译学或许更为适切。事实上, 格雷本人也曾明确指出, 在符号学理论框架下开展翻译研究会更富有成效 (Gorlée 1994)。

就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而言, 贾洪伟 (2016a: 97) 指出, 符号翻译研究隶属翻译研究范畴, 因为从符号学理论视角考察翻译问题, 仍局限于语际翻译范畴, 尚未上升到“学”的阶段。不过, 无论是格雷 (Gorlée 2005) 从符号学视角对戏剧、歌曲及其他听觉符号的翻译研究, 还是蒙娜·贝克 (Mona Baker) 从符号对等视角对新闻、广告等应用翻译的研究 (Baker 2018), 均说明学界已开始关注媒体图片、视觉图像等非语言视觉符号, 同时也说明符号学翻译研究已超出语际翻译范畴, 逐步从语际翻译研究走向符际翻译研究。

近年, 随着数字化带来的翻译形态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翻译界学者开始从符号视角审视翻译中的核心问题, 如翻译对等问题等。贝克 (Baker 2018) 的专著《换言之》(第三版)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在词语、句法、语篇和语用对等的基础上新增一章, 系统讨论了符号对等。黄忠廉、李正林 (2015: 95) 曾指出符号学视角的翻译批评优势明显, 有助于拓展传统翻译批评的研究范围。不过, 就整体研究进展而言, 王铭玉 (2016: 2) 认为“符号学翻译研究仍停滞于‘脚注式’理论探索阶段, 没能真正系统地运用符号学方法论指导翻译研究, 实现符号学与翻译学的深度融合。”贾洪伟 (2016b: 92) 则认为, 目前“仍处于‘脚注式’符号学翻译理论阶段, 尚未涉及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层面”。在谈及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及翻译研究的符号学转向问题时, 道格拉斯·罗宾逊表示, “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符号学转向”, “特洛普的研究更具普适性和综合性, 如果将来出现符号学转向, 我想应该由塔尔图学派引领”。(潘琳琳 2021: 93)

如上研究为跨学科翻译研究提供了符号学视角的方法论指导, 在拓展符号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同时, 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跨学科借鉴。

3. 问题与前瞻

符号学与翻译学研究者对两者的“联姻”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跨学科对话与互鉴对推动两者跨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立足当下研究焦点, 并基于此总结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希望为深化、推进符号翻译学和翻译符号跨学科融合提供参考。

第一, 语内、语际和符际三类翻译研究的失衡。近半个世纪来, 翻译研究总体上聚焦语际翻译, 对语内翻译与符际翻译的关注严重不足。雅各布森作为开创符号学视角翻译研究之先河的学者之一, 立足于符号学理论视角提出的翻译三分观点, 无疑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与界限, 为翻译研究描绘了一个可行的谱系路线图, 在开拓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 细究语内、语际和符际三分则可发现, 此分类的出发点依然是语言符号。即便符际翻译讨论了将语言符号转换为非语言符号, 也只涉及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单向转换, 对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讨论较少。另外, 雅各布森将语际翻译看作“真正的翻译” (translation proper) (Jakobson 1959/2012: 127), 无意间边缘化了语内和符际两类翻译。

尽管近年来多模态翻译研究开始关注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在内的多模态符号, 然而大多聚焦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之间, 而非视觉、听觉和视听等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跨符号、跨媒介

和跨模态转换(王洪林 2020)。此外,尽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从符号学视角开展翻译研究有助于拓展翻译研究界限与视野,可以更好地回应符际翻译问题,不过,截至目前,符号学视角的符际翻译研究尚未形成体系,理论建构亟待加强。

第二,翻译符号学和符号翻译学两个跨学科分支研究失衡。尽管翻译研究与符号学“联姻”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然而对涉及翻译本质的符号转换问题的研究尚有丰富空间。此外,翻译符号学和符号翻译学相关概念存在混淆现象,相关概念重叠与交叉现象明显,两者学科边界有待廓定,各自学科内涵亟待厘清。符号学研究学者逐步意识到作为跨符号表意的翻译活动对拓展和深化符号学研究的重要价值。然而,翻译研究者对符号学视角下翻译问题的跨符号阐释关注不够。

翻译符号学研究已初具规模,而符号翻译学研究却相对薄弱,且任重道远。国内对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研究主要立足点依然在符号学,而非翻译学。比如,翻译符号学是建立在语言符号学基础之上的,是对语言符号学的深化与拓展,目的是推动语言符号学发展。翻译符号学从符号学视角审视翻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为翻译的符际转换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翻译符号学在研究方法与路径方面对符号翻译学均有可资借鉴之处。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翻译符号学概念、学科内涵与学科框架等开展了较为系统的讨论。但还应看到,就目前针对翻译符号学的研究而言,主要聚焦学科框架与学科建构层面的宏观讨论,对翻译核心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与翻译本体研究之间的对话有待加强。从符号学视角考察翻译问题有助于厘清翻译本质,对翻译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拓展符号学研究视角与视域。不过,相对于其他翻译研究范式而言,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理论创新方面均有提升空间,要建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尚需时日。

第三,符号翻译学研究总体呈碎片化特点,系统性与整合力度不够。学界对符际翻译中的意义再生问题缺乏系统、整合式研究。较少有学者从符号学视角切入探讨作为符号表意的翻译活动以及翻译中不同层级的符号关系。更少有学者从符号表意视角切入探讨翻译中的意义再生与变异。从符号学视角开展跨学科、跨符号、跨媒介及跨界翻译研究有利于实现符号学与翻译研究两者的对话,也有利于推动各自学科向纵深发展。

符号学对翻译研究理论借鉴价值明显,从符号学视角开展翻译研究对拓展翻译研究视野与范围的意义重大,“可惜当前翻译界和符号学研究界对符号的间性转换行为研究仍不够深入,引进也不够充分,特别是有关翻译与符号学联姻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贾洪伟 2018: 26)。符号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联姻”价值已得到学界认可,但仍待深化、拓展。

第四,多重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有待开拓。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研究聚焦翻译的社会符号功能,无疑拓展了翻译研究途径(王铭玉、任伟 2017)。但其对符号意义本身的关注不多。就研究的范围与系统性来说,翻译符号学研究已建成体系,符号翻译学研究亟待拓展。

符号翻译学研究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不足之处在于:实践层面,主要聚焦语言内部与/或之间的符号转换问题,对语言符号之外的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关注远远不够;理论层面,主要借鉴社会符号学理论来考察翻译中的符号转换问题,对其他符号学分支理论借鉴不足。鉴于此,符号翻译研究有待从其他符号学分支汲取养料,如解释符号学、哲学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生物符号学、总体符号学等。

此外,针对当前翻译研究对符号学理论借力不够、重借鉴轻阐发、重理论应用轻理论创

新等问题,有待重构符号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开辟理论建构和实际应用之间的对话融通路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翻译学和符号学的跨学科对话与融合,为二者跨学科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并贡献理论智慧。

4. 结语

就研究重点与焦点而言,翻译符号学和符号翻译学各有侧重,且优势各异。就翻译符号学而言,一方面,侧重宏观理论探讨,对跨符号表意问题关注不够;另一方面,侧重对个别翻译问题的探讨,研究系统性不足,尚缺少跨学科整合性研究。就符号翻译学而言,一方面,主要借鉴语言符号学与社会符号学理论,对其他符号学分支借鉴不够;另一方面,国内符号翻译学研究整体上停留在理论引介与理论应用层面,在理论建构、理论创新与元理论反思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综述如上观点,从符号学视角审视跨符号表意等翻译核心问题,不仅有助于厘清翻译本质,也有助于拓展符号学研究思路和范围。而从符号学视角审视翻译中的意义转换,进而考察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在内的跨符号表意行为,可有效地规避因过度关注语言符号表意行为而导致的学术盲区。鉴于此,符号学与翻译学之间的跨学科“联姻”亟需通过符号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合作研究实现。从长远来看,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整合性研究对两门学科各自的发展理论价值凸显,可为两者学科交叉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

注释:

- ① 4 篇翻译符号学论文分别为:蒋晓华 2003 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李明 2005 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翻译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视角》,王治江 2007 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符号学翻译初探》和佟颖 2010 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符号学与翻译基本问题研究》。(转引自王铭玉、任伟 2017: 28)

参考文献:

- [1] 丁达·格雷.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 [M]. 贾洪伟,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
- [2] 黄忠廉,李正林. 翻译批评体系符号学考量 [J]. 外语教学,2015,(4): 95-97,113.
- [3]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 [J]. 外语教学,2016a,(1): 94-97.
- [4] 贾洪伟.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 [J]. 山东外语教学,2016b,(3): 90-100.
- [5] 贾洪伟. 雅可布森三重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c,(5): 11-18.
- [6] 贾洪伟. 有关翻译符号学的思考——格雷《元创作》译后感悟 [J]. 翻译论坛,2018,(3): 26-32.
- [7]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初探——以格雷论文选析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0.
- [8] 姜奕村. 理论的演进与方法论革新——第十三届世界符号学大会综述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5): 66-73.
- [9] 吕红周,单红. 彼得·特洛普的翻译符号学观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5): 33-39.
- [10] 罗进德. 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 [J]. 中国翻译,1988,(1): 6-9.
- [11] 潘琳琳.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文本再生——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为例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5): 26-32.
- [12] 潘琳琳. 翻译符号学观照下文本再生中思想意识的变异 [J]. 符号与传媒,2018a,(2): 223-233.
- [13] 潘琳琳.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红高粱》文本阐释 [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b.
- [14] 潘琳琳. 符号学与翻译学研究的共振——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访谈录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21, (1): 89-93.
- [15] 苏珊·佩特丽莉. 符号疆界: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M]. 周劲松,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 [16] 孙凤. 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理论研究 [D]. 济南: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 [17] 佟颖. 社会符号学与翻译基本问题研究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18] 王洪林. 符际翻译中的意义再生与变异研究——以多模态翻译为例 [D]. 成都: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0.
- [19] 王丽娟. 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综述 [J]. 重庆与世界 (学术版), 2013, (7): 60-62, 84.
- [20]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刍议 [J]. 中国外语, 2015, (3): 1, 22-23.
- [21]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5): 1-10, 18.
- [22] 王铭玉, 任伟. 从语言符号学到翻译符号学——王铭玉教授访谈录 [J]. 外语研究, 2017, (5): 25-30.
- [23] 许钧. 翻译论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24] 赵星植.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25] 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3rd Ed.)*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26] Eco, U.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 [M]. A. McEwen, Trans.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 [27] Goriée, D.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12)* [M].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1994.
- [28] Goriée, D. L. *On Translating Signs: Exploring Text and Semio-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4)* [M].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4.
- [29] Goriée, D. L. *Song and Significance: Virtues and Vices of Vocal 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5)* [M].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5.
- [30]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C] // L.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59/2012: 126-131.
- [31] Kourdis, 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C] // P. P. Trifona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emio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Springer, 2015: 303-320.
- [32] Lorusso, A. M. *Cultural Semiotics: For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Semiotic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33] Lotman, Y. M.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1990.
- [34] Petrilli, S.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
- [35] Ricoeur, P. *On Translation* [M]. E. Brennan,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36] Steconi, U. Five reasons why semiotics is good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 // Y. Gambier, M. Shlesinger & R. Stolze. *Doubts and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Benjamins, 2007: 15-26.
- [37] Torop, P. Towards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J]. *Semiotica*, 2000, 128 (3/4): 597-609.
- [38] Torop, P. Methodological remarks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J]. *Semiotica*, 2007, 163 (1/4): 347-364.
- [39] Wang, B. Exploring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studies: From semiotic perspectives to multimodal analysis [J].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8, 14 (2): 149-161.

(责任编辑 刘心)

to be predicated on the dynamic social conditions. The image of mirror making its various appearances in different forms reflects the identity of subjects and hampers their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ir “self”.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Ancestor G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an’s Mirror Theory from three aspects , namely ,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 ,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 , as well as the “self” and “polyphonic” mirror images to examine Miller’s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s’ cross-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Usage-inspired L2 Instruction: Tenets ,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 by XU Jin-fen , p. 82

Usage-inspired L2 instruction is an emerging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derived from the usage-based approaches to SLA , and it represents a new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instructed SLA research. This article briefly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tenets of usage-inspired L2 instruction ,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at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it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 and then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teaching method by introducing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Finally ,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view of the lack of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usage-inspired L2 instruction in China , it is hoped that more researchers divert their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in the future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so as to enlighten the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hibition Effects of L2 Phonology and Orthography in L1 Processing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 by QU Chun-hong , p. 90

An on-line RT experiment of L1 semantically-relatedness judgment is designed and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overlaps of pronunciation (perfect homonyms) and scripts (homophones) of the L2 equivalents of L1 words ,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hibition effects of non-dominant L2 phonology and orthography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L1. The result supports the non-selective processing of bilinguals in that the L2 phon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information can be automatically activa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L1 and inhibits the processing of L1 , and provides more evidences in lexical level from the processing of script and non-script languages for BIA/BIA+Model.

A Corpus-base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Styles of *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 by ZHANG Ji-dong , DU Ruo-fan , p. 107

Based on the English-Chinese parallel corpus of the English book *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 this paper make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n the styles of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by Du Mo and Song Nianshen respectively.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are found to b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3 dimensions , namely , the situation of the syntactic explication , the situation of the whole structure ,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conveyed information. The reason behind the differences can be traced to the translators’ social backgrounds , the translations’ publication dates as well as the publication market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can help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styles from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arative description of translations’ styl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Border-crossings between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 by WANG Hong-lin , p. 116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wo interdisciplinary branches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semiotic translation studies. It reviews the focus of the border-crossing studies of the two disciplines , and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present studies and further predicts the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rough critically clarifying the focus for border-crossings of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 it is hopeful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new perspectives for advancing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studies of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